

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

朱凤瀚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近年来新刊布的西周金文中的历日资料，对西周金文历谱作了新的调整，研究重点集中在西周中期穆王至孝王在位的年代及其历日上。文章同时对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方法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 西周金文 历谱 金文历日 诸王年代

近年来，西周金文中有关历日的新资料陆续发现，给西周年代学的研究带来颇多启发。其中部分资料笔者曾先后有文章作过讨论^{〔1〕}。现将此前所写文章未涉及到的或又有不同认识的几篇金文历日新资料，集中在此作一探讨，并对今后进一步研究西周金文王年历谱应采用之方法略表浅见。

一 吮簋与懿王历日

吮簋的铭文〔图一〕发表于2012年出版的吴镇烽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下简称《铭图》）中，编号为05386，该器为某私人收藏，器形图像未刊。铭文释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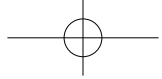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一〕吮簋铭文



唯十年正月初吉甲寅，王在周（般）大室，旦，王各庙，即立，瓚王。康公入门右吮立中廷，北卿（嚮）。王乎乍册尹册命吮曰：戕留乃且（祖）考繇又（有）畀（功）于先

〔1〕 《土山盘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师西鼎与师西簋》，《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1期；《覲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几件铜器》，收入《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王^①，亦弗望（忘）乃且考癸（登）裏毕典封于服^②。今朕不显考癸（共）王既命女更乃且考事，乍嗣（司）徒。今余佳𠄎（申）先王命女（汝）𠄎嗣西𠄎（朕）嗣（司）徒，讯讼，取𠄎（𠄎）十孚，敬勿𠄎（废）朕命。易女（汝）鬯卣、赤市、幽黄、攸勒。眈拜稽首，对扬天子休，用乍𠄎（朕）刺（烈）考幽叔宝尊簋，用易（赐）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③。

铭文中，记录王册命语中有“今朕不显考癸（共）王既命女（汝）更乃且考事”句，由此可知，时王即共王之子懿王。铭文既记王年为“十年”，则懿王在位年必不会少于十年。

这样一来，《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所刊布的《西周金文历谱》中，将懿王在位年数定在前899至前892年，共八年时间，即必须要调整了^④。调整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向下延长，一种是向上，冲破前899为懿王元年的设置。

如保留懿王元年为前899年的说法^⑤，则只能将懿王在位年下延。依此，懿王十年即前890年。但从历表上看^⑥，前890年正月丙申朔，十九日甲寅，与簋铭所言历日“正月初吉甲寅”不合，因为从迄今所见西周金文资料提供的“初吉”时日范围（多在每月上旬，即初一至十日的范围内），无论怎样，皆不会晚到十九日。这种情况表明，从金文历谱角度来看，以前899年为懿王元年的设置，也有改动的必要了。

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新发现的西周历日资料，已经促使学者们考虑调整十四年前断代工程确定的《西周金文历谱》的框架，最明显的如𠄎公簋铭文显示的成王在位不少于二十八年，即已经牵

① 𠄎，字上部不甚清楚，大致作此形，字应是从𠄎持𠄎（似鼎形器），𠄎亦声。同音且同义的字或作𠄎。从柞伯鼎铭文“在乃圣祖周公繇有共于周邦”（《文物》2006年第5期，页68）可知，此字“𠄎”上所持可以有变化，但重在读“𠄎”音，即读同“共”，“共”、“功”通，皆见母东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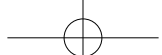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② 本铭“望”字从拓本看写法较特异，目下之人身不像一般此字作侧立形，而似作正立形，其下所从字符看不清楚。

③ 本铭中，少数词语需作考释。其中“王各庙，即立（位）”后接“𠄎王”句，前所未见。“𠄎王”，或即当读作“赞王”。“赞”义为导，《国语·周语上》：“太史赞王，王敬从之”，韦昭注：“赞，导也。”但铭文中王已先即立（位）。所以，“赞”在这里也似非导义，或当读如《说文》所释“见也”，即进见，是司仪礼之官告王已即位，进见之礼开始，属册命礼之仪式中的一项。由此看，他铭中虽未言此仪式，但很可能也都是有的。“𠄎”应当读作“在载”，“载”始也，即“在当初”的意思。“癸（登）裏毕典封于服”一句中，“癸”当读作“承”，受也。二字均章母蒸部字。“裏”读作“理”，治理之意。此句铭文大意是说，于其职守中受理那个典封之事。“典”是将赐封土田登录在册，封是封土，凡赐封土田皆要封之。六年𠄎生簋铭文有“余典勿敢封”句，可参考。眈被王命为司徒，所司正为土田民人，“典封”即其职事。“西𠄎（朕）”疑区域名。“取𠄎（𠄎）”之义参见拙作《西周金文中的“取𠄎”与相关诸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2007年9月。

④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页30—3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⑤ 定前899年为懿王元年，主要是根据将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解释为“日出之际发生的一次日食”，并将“郑”的地望定在华县或凤翔，然后依据对日食造成的天光视亮度进行测算的数学方法，计算出前1000-前840年间哪几次日食在西周郑地可以造成此种“天再旦”的现象。参见前揭《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页24—25。

⑥ 本文所据历表，为张培瑜先生所作《天象合朔满月表》（前1500-公元2050年），收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扯到成王或康王乃至宣王以前诸王元年在位年的调整问题^①。睨簋铭文的刊布，再次将调整西周金文历谱的工作提到日程上。

在不明确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的情况下^②，由西周金文历日资料去探讨王年历谱，同时体会西周历法，笔者理解这实际上是一个依靠日益丰富的金文历日资料逐步摸索，逐渐深化的过程。能容纳并排入更多的金文历日资料的方案，应该是更接近西周王年实际历日的方案。但如何操作来构建这个方案，还应该建立一个规则，初步考虑，这一规则似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重视文献所记西周诸王年数的参考价值。1998年，笔者在为所编集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一书撰写的长篇述评中，曾针对西周元年的确定问题写到“通过对诸类文献中所见西周诸王在位年数作系统、深入研究，可以产生一个西周积年的年代范围，这样产生的年代范围与上述战国至汉代文献中直述积年数的范围（与概括年代）之综合，可以形成文献中所见西周积年的年代框架。根据此框架即可以对应形成西周元年（即武王克商年）允许值的年代区间”，同时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制定可以得到古代文献典籍支持的年数范围。但在这个区间内欲确知那一个年代为西周元年以及诸王在位年数，光靠文献当然是不易做到的，需要将文献与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历日资料及天文学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比对筛出。

（二）金文年历的研究应该重视的是构建王年组。2004年笔者在讨论师酉鼎历日所属王年时，曾讲过如下不成熟的认识：“现在对西周金文王年历谱的研究成果，已可以大致将西周中期（穆王至孝王）阶段的青铜器，按所属不同王世分组，诸器按王年所排序与器形、纹饰及铭文字体特征基本相适应，历日亦相契合。在理论上，这样的几个器组，各组所属王年始年可以按5年时差前后移动。”^③这种方法当然亦适合于“四要素”俱全的西周晚期各王年器物的分组。各王年组的年代长短，以及彼此的衔接点，应该与以上第一条所言结合起来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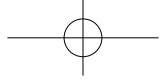
（三）在目前已有断代工程提供的西周金文历谱的情况下，即使依据新的资料深化对金文历谱的探讨，仍可以以此历谱为出发点与基础。因为此历谱，虽已发表十余年，且因新资料的发现而被指出不够严谨，但其西周元年的设置与王年组的年代范围划定，并非离实际年代相差过远。

（四）根据以往排西周金文历谱的情况，断代工程的历谱中，西周早期武王克商亦即西周元年的年代不宜再向下延，因为历谱中西周中期的年代本已紧张。从依靠金文排历谱的角度，似宜将西周

① 朱凤瀚：《睨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李学勤：《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收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63期，2007年4月28日，后收入《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王泽文：《睨公簋试读》，收入《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线装书局，2008年；李伯谦：《睨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中原文物》2009年第1期；彭裕商：《觉公簋年代管见》，《考古》2008年第10期。

②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29页上，讲到西周金文历谱的性质时，即已明确“由于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处，金文历谱只能是一个西周王年表”。

③ 朱凤瀚：《师酉鼎与师酉簋》，《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1期。实际上，所谓王年组在按上述规律调节其所属王年之元年时，其中有的器物会被排除。但其中具有典型器意义的器物一般则会保存在内。



〔图二〕斝簋器形



〔图三〕斝簋铭文



早期年代上提，即将西周元年酌量提前，从而适当扩大成王与康王年数，特别是适当扩大西周中期穆王后几位王的在位年数，藉以解决西周中期器物年代过于拥挤的状态。

按照上述想法，在原有《西周金文历谱》的基础上尽量作微调，而对斝簋历日提出的懿王在位年数的问题，则可以暂将懿王十年的年代定在前893年，此年正月癸丑朔，二日甲寅，与斝簋十年正月初吉甲寅的历日相合。如此，则懿王元年即可以暂定在前902年。但是如果将懿王元年定在此年，则距孝王之间的年数已有限，不可能容下理应在共懿时段但又排不进共王历日中的器物（如十六年士山盘与二十年休盘），故将懿王十年提前5年，定在前898年，而懿王元年即定在前907年。前898年正月癸丑朔，二日甲寅，合乎斝簋“正月初吉甲寅”之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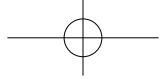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从以上讨论可知，斝簋铭文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突破了懿王元年为前899年这一在以往构建西周金文历谱时必要遵守的基点；其次即是懿王在位年数延长到10年以上（延长后年数暂设为二十年），而在断代工程简本的历谱中，懿王只给了八年。

二 斝簋与虎簋盖及共王在位年数

斝簋亦为《铭图》著录，编号为05295^{〔1〕}。其形制为盆形簋，侈口，腹壁近直，下腹微垂，双附耳，耳顶高出器口，圈足作斜坡状，底有极矮的直阶，口沿下饰一周对称的S形顾龙纹〔图二〕，器内底有铭文〔图三〕。与此器形制相近的是1975年扶风法门乡庄白村西周墓（即伯戎墓）出土的伯戎簋，唯伯戎簋腹壁稍显斜直内敛，腹饰瓦纹^{〔2〕}。伯戎簋在拙著《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定为西周青铜器第三

〔1〕 作器者名“斝”，此字见于《说文》，《说文》写作“𧈧”，曰：“虎声也，从虎斤声。”今音yin。

〔2〕 扶风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戎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又见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七卷，页1373—1375，巴蜀书社，2005年。



期，即相当于穆王、共王时期^①。长安花园村M15出土的两件有盖簋M15:15、16^②，其器身形制亦同于斚簋。在拙著中，此墓出土铜器被排在西周青铜器第三期即穆、共阶段。此外1973年在扶风刘家沟水库M1出土的伯簋亦与斚簋形近，此墓中与伯簋同出的还有一鼎，垂腹甚剧^③。拙著将刘家沟水库M1所出鼎、簋定在西周青铜器第四期，即在懿王至夷王阶段。斚簋所饰S形顾龙纹亦是上述三、四期铜器常见纹饰，所以，单纯从形制与纹饰上看，斚簋大致可以认为是在穆王至懿孝之间。但斚簋铭文字体仍带有很强的穆王铜器铭文那种秀雅而拘谨的字体特征。这样来看，我们可以先暂将斚簋年代定在穆王至共王阶段。下面再根据铭文历日来看其历日适合于哪位王。簋铭释文如下：

唯廿又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王在宗周各大室，即立，毛伯入右斚立中廷，北卿（嚳）。王令乍册宰（憲）尹易（賜）斚鑒旂，用疋（胥）师穀嗣田（佃）人。斚拜首稽首，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孝（考）欽父宝簋，孙子万年宝用。

在断代工程所制定的金文历谱中，穆王元年设定为前976年，从现有资料看，此设定亦已需要调整，该历谱中现归入穆王王年组的铜器有三件，即二十七年卫簋、三十年虎簋盖（甲、乙）与三十四年鲜簋，其中鲜簋（铭文曰“王才〈在〉葵京宵〈禘〉于昭王”）更是穆王时代的标准器，对可否容入穆王年组的铜器有检验作用（即如假设之穆王元年及其历日系统可以容下某器历日，但不能同时容下鲜簋历日，则此假设之穆王系统即未有成立之可能。反之亦然，即容下鲜簋历日的穆王元年及其历日

〔图四〕虎簋盖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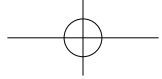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五〕虎簋盖铭文



①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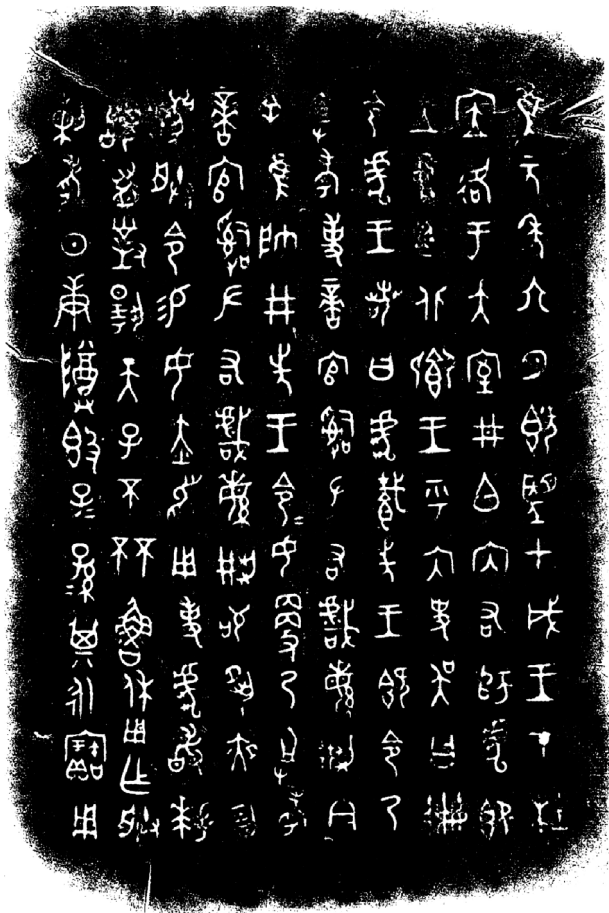
③ 前揭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六卷，页1212—1216。



〔图六〕师虎簋器形



〔图七〕师虎簋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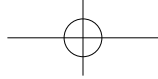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系统如容不下某器历日，则该器即大致可以认为不属穆王时器），凡是可以归入穆王年组的铜器在历日上即应该可以与此器相容。

至于二十七年卫簋，因考虑在历表中，五祀卫鼎入共王，而九年卫鼎、三年卫盂入懿王，故在本文中将之移入共王。

三十年虎簋盖〔图四，图五〕，则涉及到与其相关的师虎簋〔图六，图七〕。师虎簋铭文与虎簋盖铭文有类似处，如在格式上，均是王令“更乃取(祖)考”之职事，职事皆有关军事，且二器均是为“文考(或称烈考)日庚”作器，故二器名“虎”之作器者应为同一人。如此，则二器的年代应较为接近。师虎簋器形为圆鼓腹、敛口、全瓦纹，上腹部接双小兽首形半环耳，坡形圈足有矮直阶，与此器身大致同型的簋还有即簋、豆闭簋、乖伯簋、无彘簋、询簋、遯簋(圈足下带小柱足)等，这些器物的年代大部分属于西周中期偏晚，即共王以后至懿、孝王时期，有的已接近西周晚期^{〔1〕}，似不会早到穆王。所以师虎簋的年代亦应定在西周中期晚叶或入晚期初(本文依其历日排在夷王元年)。这样看来，三十年虎簋盖历日即亦不适宜排在穆王时期了。以往将其定在穆王，也是因为依据当时所见资料，西周中期诸王中，穆王以后诸王年代未有在二十五年以上的。在本文中暂将其从穆王中撤出，排在共王三十年。顺便说一下，三十年虎簋的字体，虽亦纤小，但不似常见的穆王时期的字体那样端庄、典雅、凝重，还是与穆王时期的字体有别。从这点来看，将三十年虎簋盖移入共王末叶应是比较妥当的。

现在来看虢簋历日可否归入断代工程历谱中的穆王系统中。按此系统，穆王元年是976年，廿八年即是前949年，但此年正月己卯朔或己酉朔，己酉朔虽与丁卯在同月，但丁卯在十九日，与虢簋“正月既生霸丁卯”中丁卯之属既生霸不能相合。即

〔1〕 参见张长寿、陈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7—69，文物出版社，1999年。



使按本文调整过的历表，穆王元年前996年，二十八年前969年，该年正月乙巳朔，二十三日丁卯，亦不合𠩺簋。这说明𠩺簋不属于穆王时期。下面再看此二十八年是否可以归入共王历日中。

共王年数在断代工程历谱中，只设置了二十三年，𠩺簋的历日表明，共王在位年数有可能亦得突破，即要适当延长，使不少于二十八年，而且𠩺簋在历谱中的位置要能与以往研究中已排进共王王年组的多数器相容。按上文所论，懿王元年可暂设在前907年，则上溯及共王历日，在共王历日中适合𠩺簋历日的是前914年，故可暂将此年拟定为共王二十八年，该年正月丙辰朔，十二日丁卯，合𠩺簋历日“正月既生霸丁卯”。如此，则共王元年可上溯至前941年。而且依上文所云，将三十年虎簋盖从穆王器中撤出，目前看西周中期范围内也只能归入共王，如此则共王年数不会少于三十年。此一共王历日系统当可容下若干共王组器物（见[附表一]“西周金文年历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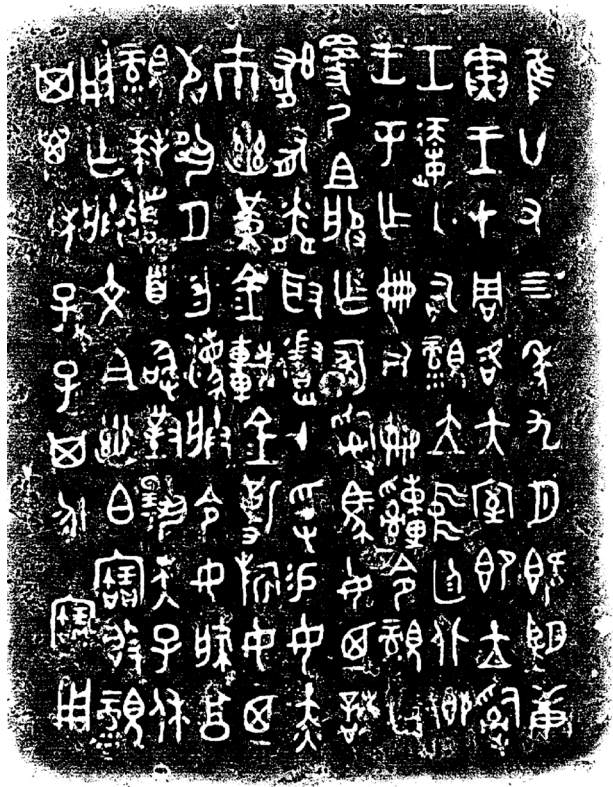
三 𠩺簋与吴盃的年代

𠩺簋是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入藏的西周有铭青铜器。微垂腹，双凤鸟形半环耳，腹部饰有对称的垂冠大鸟纹，圈足下接一镂空的、波带状的支座[图八]。内底有铭文一百一十字[图九]^{〔1〕}。从器形与纹饰看，应定为西周中期穆、共王时期器是没有问题的。铭文有历日为“唯廿又四年 九月既望庚寅”，因为如上文所言，根据当时所掌握的金文历日资料，西周中期王年，穆王以外未有超过二十五年的，而𠩺簋历日又恰可排进断代工程《西周金文历谱》的穆王历日中，故多数学者将之认作穆王时铜器。而且按断代工程金文历谱，此器历日亦入不了共王历日中。但笔者当时未参与讨论，主要是颇疑𠩺簋可否入穆王，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器铭文的字体。众所周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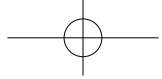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八〕𠩺簋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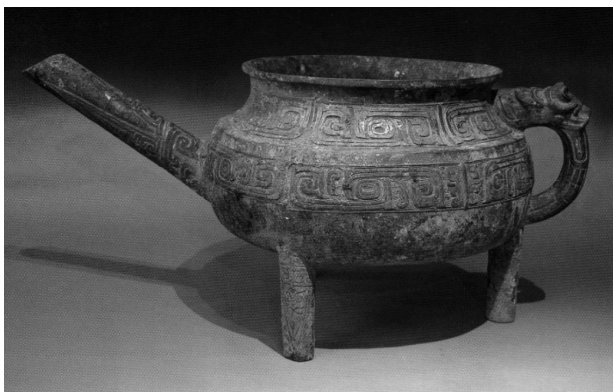
〔图九〕𠩺簋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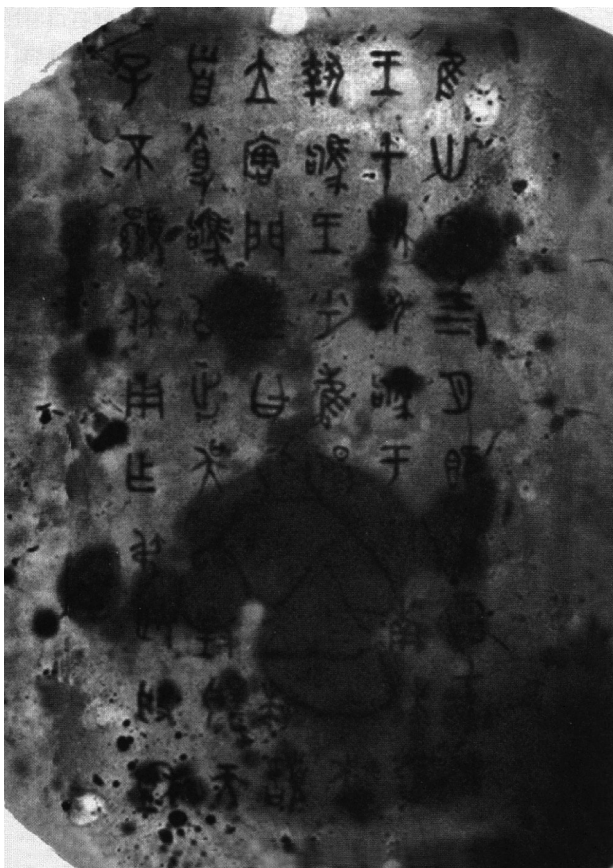
〔1〕 王冠英：《𠩺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3期。



〔图十〕吴盃器形



〔图十一〕吴盃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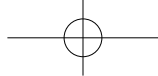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尤其是当时王畿区域内由王朝卿士们所做器物，铭文风格高度趋同^{〔1〕}，都是那种非常整齐的小字形，风格典雅、俊秀而又显拘谨，与颍簋铭文有很大区别，颍簋铭文字体已非小字形，字体多作长方形，结构、笔画上已开始具有某些西周晚期之风格。固然即使是在王畿区域，也未必同一时期的字形特征完全统一，只是穆王时期金文字体的特点与趋同性实在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在新资料未出现前，断代工程给予的金文历谱框架中，颍簋历日确只能合乎穆王。

现在，因为依上文所论述的那样，懿王元年已不必固守在前899年，更重要的是共王年数可以扩大，对这一颍簋所属王年自然可以作新的考虑。在本文下面所提供的金文历表中，当将共王元年选定在前941年时，其二十八年是前914年，该年正月丙辰朔十二日丁卯，合乎簋铭“廿又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之历日。

吴盃是中国文物咨询中心近年来所征集的西周有铭铜器，原为香港私人藏家所藏。该器的形制、铭文〔图十、十一〕，笔者曾在《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几件铜器》^{〔2〕}（下简称《简论》）一文中介绍过，亦可见《铭图》14797。其铭文中所记历日为“唯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由铭文知作器者是“作册吴”。在《简论》中，笔者亦是碍于当时资料所支撑的金文历谱体系，虽曾试图将此器置于西周中期，但其卅年的历日只能考虑入穆王，而又不能纳入以鲜簋为标准器的穆王历日系统中，故对其年代曾颇感纠结。在《简论》中，曾根据吴盃的形制、纹饰、字体具有的一些西周晚期特征，推断其属西周晚期，并按历谱，将其年代归于厉王，现在看来确当作重新思考了。如今，在新资料的发现使构筑金文历谱新框架成为可能的情况下，由于共王在位年数已达到三十年以上，所以吴盃的年代已具备重新考虑的条件。

〔1〕 这反映出，西周王畿区域内青铜礼器的制作在工艺传统与制作场所上可能有集中化的态势。关于类似的问题，当另文再作探讨。

〔2〕 该文收入朱凤瀚主编之《新出金文与西周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按照本文所拟定的共王在位年数(35年),共王三十年在前912年,是年四月癸酉朔十日壬午,则与吴盃“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相合。这为吴盃入共王提供了历日依据。此外,《简论》中已经指出过,吴盃的形制与现藏瑞典的师转盃近同[图十二],惟师转盃腹较深而鼓,且其鏊上端接于上腹部,与吴盃接在颈部不同。师转盃口沿下饰分尾长鸟纹,腹饰瓦纹,综合其铭文字体,其年代应在西周中期偏晚,这也为吴盃之归属共王晚期提供了形制的依据。在《简论》中笔者还曾论及吴盃在纹饰、铭文字体等方面接近西周晚期的一些特点,这是不能忽视的。吴盃虽可入共王,但已在共王三十年,此时距西周中期开始之穆王元年已有八十五年之久,按照青铜器之形制特征大约在五十年左右会有变化的估计,则吴盃所具有的西周晚期特征,表明到了共王时期,亦即进入西周中期晚叶后,青铜器已开始滋生了某些西周晚期的因素。另一作器者亦名“作册吴”的器物吴方彝盖,在本文所拟历表中归入共王二年,是年为前941年,应是同一人先后所作器物。

觚簋与吴盃之王年归属问题的解决,进一步说明新发现的金文历日资料对于促进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向更为科学、客观的方向发展,具有极大意义,同时也体现出这些资料对青铜器形制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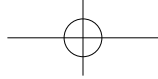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四 倬叔壶的王年归属

倬叔壶亦为《铭图》著录,编号12401。此壶造型比较特殊,其器身作长颈圆腹形,盖圆鼓,上有高圈足状捉手。颈两侧接双兽首提梁,提梁甚宽扁[图十三]。器、盖皆有铭文[图十四]。此形制容易使人想到殷代早中期流行过的长颈圆腹卣,如安阳小屯M5(即妇好墓)出土的此型卣(M5:765),小屯M18亦出土过同形卣^①。但这种形制的卣的提梁均接在上腹部,且均随器身与长颈形状弯曲,与此件倬叔壶有所不同。倬叔壶之造型也许与上举殷代的长颈圆腹卣有一定渊源关系,因为西周早期壶不甚流行,西周早期稍晚,即出现了所谓“橄榄型壶”,而此型壶在西周中期才盛行,与倬叔壶形制颇为不类。倬叔壶去掉提梁,器身作圆鼓腹,并未受到昭王至穆、共王时期流行的垂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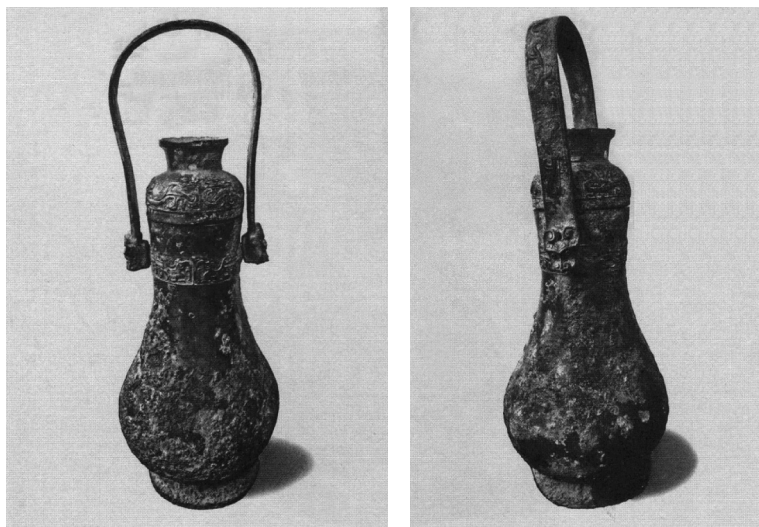
〔图十二〕师转盃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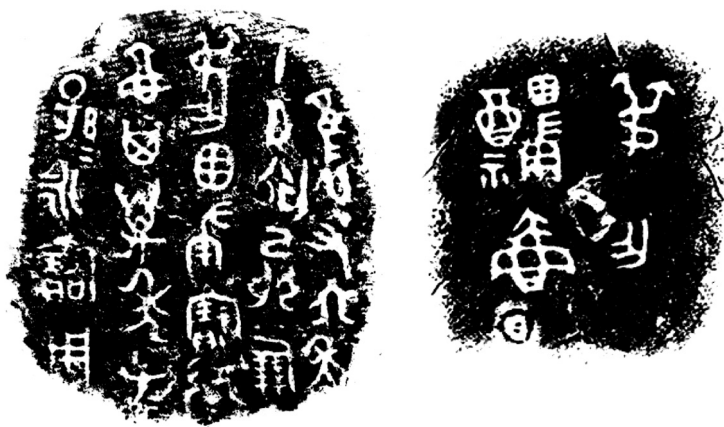
① 以上二器图像见前揭朱凤瀚著《中国青铜器综论》上册,页204。



〔图十三〕匭叔壶器形(正、侧面)



〔图十四〕匭叔壶铭文(左:器铭,右:盖铭)



风格的影响,而器身与盖的形制也已接近西周晚期开始流行的长颈鼓腹壶(如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几父壶)。但匭叔壶腹中部的圆鼓,并没有西周晚期圆腹壶的垂腹特征。所以这件器物的造型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但很可能是殷代的长颈圆腹卣与西周晚期长颈圆腹壶的形制相衔接的线索(西周早期虽有长颈、扁圆腹的提梁卣,但腹扁圆之特征难以与西周晚期之圆腹壶相联系)^{〔1〕}。匭叔壶的颈部、盖顶边缘、提梁上面均有对称的长尾鸟纹饰带,张懋镠先生已指出,长尾鸟纹的形象与伯戣壶上的鸟纹非常相似^{〔2〕},其特征在于长尾羽与身躯相连,尾羽下有两反向外勾的短羽。笔者在上举《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将伯戣墓出土铜器归入西周铜器第三期,即穆共时段。此种形式的鸟纹,在此一时段实相当流行。综合上面对匭叔壶形制、纹饰的分析,其年代还应归在西周中期时段内,更具体地说,由于其器身(及盖)的形制已接近于

西周晚期有盖的长颈圆腹壶,所以更大的可能是在西周中期偏晚,不早于共王。

匭叔壶的铭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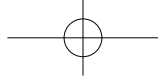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己卯,匭叔作田(田)甬(甬)宝甬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器铭)

叔作田(田)甬(甬)甬壶。

由于在本文新构拟的“西周金文年历表(见〔附表一〕)”中除穆、共二王外,西周中期另两位王——懿、

〔1〕 在前揭朱凤瀚著《中国青铜器综论》中,从器型学分类角度将有提梁的酒器统称为“卣”(尽管有的此型器自名为“壶”)。此件匭叔壶器身确与长颈圆腹卣的器身有差距,相当接近于西周晚期以后的壶,为研究方便,暂从《铭图》的叫法,称其为壶。

〔2〕 张懋镠:《新见金文与穆王铜器断代》,收入《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孝王在位年数均较短，而倮叔壶的年代为“廿又六年十月初己卯”（“初”应即是“初吉”），故其只能在穆、共二王中寻其归属。将此器历日放到本文所拟金文历表中的穆王历日中，以前996年为穆王元年，则二十六年为前971年，是年十月壬子朔，己卯已是二十八日，显然与倮叔壶历日不合。所以，倮叔壶不会是穆王时器。查本文所拟定的共王历日，元年为前941年，二十六年为前916年，是年十月甲子朔，十六日己卯，亦与倮叔壶历日不合。倮叔壶未能入本文历表穆、共王器组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共王元年不像本文那样设在前941年，而是设在942年，倮叔壶即可以与共王二十六年（设在前917年）历日相合。此外，本器铭文字体书写较为松散，如是年“己卯”本是“乙卯”，则可以入本文金文年历表共王二十六年（十月壬子朔四日乙卯）。

倮叔壶是倮叔为田帚（妇）所作，“帚”字写法不规范，旧或读作“甫”不妥（“甫”上部与此字字形不尽合）^①。“田妇”很可能是倮叔的配偶，娶自田氏，但亦不排斥是其嫁予田氏的女儿。倮氏墓地已在山西绛县横水镇被发现并发掘^②。田氏亦见于国家博物馆所藏晋侯簋（铭曰“晋侯作田甗（妻）罍殷”）（簋甲），“田妻”是出身于田氏的晋侯夫人^③。倮氏在西周时是晋国的附庸，晋、倮皆与田氏通婚，知田氏在晋南很有影响。倮叔壶虽因某种原因未能落实其所属王年器组，但其铭文之学术价值仍是值得重视的。

五 夔簋可入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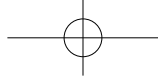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夔簋为近年国家博物馆入藏器，其形制近同于上举斚簋，也是敞口、双附耳的盆形簋，腹壁近直，近底部圆转内收，圈足作斜坡状，有短直的阶跟，惟腹较浅而显宽扁，且素面，只在上腹部有双凸弦纹，口沿下有一道凸弦纹。有盖，盖顶有圈足状提手。与此簋形近的是长安花园村M15出土簋（M15:15、16）^④。花园村M15更近于穆王时期。夔簋铭文，前面记历日曰“唯廿年又四年才（在）八月既望丁巳”，其字体亦与穆王时流行的典雅、拘谨风格近合。依照上文对共、懿王年数的推拟，将穆王元年设在前996年（穆王在位年仍按《史记》所言之55年计），穆王廿四年即为前973年，是年八月乙未朔，丁巳为二十三日，而本月庚戌望，丁巳在庚戌后第七日，只能大致可以认为还在“既望”范围内，其历日与夔簋“八月既望丁巳”近合。

① “帚”与此铭中写法近似的例子，见义伯簋（“妇”所从“帚”作），又见邛君壶（“妇”所从“帚”作），君鼎（“妇”所从“帚”作），均见《金文编》页794、795，中华书局，2011年。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③ 朱凤瀚：《对与晋侯有关的两件西周铜簋的探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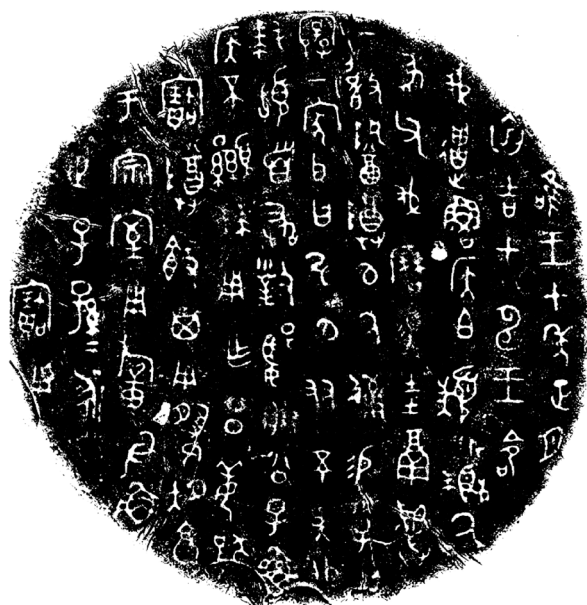
④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期。



〔图十五〕伐簋器形



〔图十六〕伐簋铭文（盖铭）



六 伐簋历日不在西周中期诸王中

伐簋，2012年7月笔者在北京获见于中国文物咨询中心^{〔1〕}。这件簋盖顶与腹部饰瓦纹，圈足下接三小扁足，口沿下与盖外圈饰一圈窃曲纹，圈足上饰斜角云纹〔图十五〕。这种形制存在于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早期时段内。其器、盖同铭，器底铭被锈遮掩，盖内铭文较清楚〔图十六〕，释文如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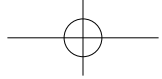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唯王七年正月初吉甲申，王命伐遗鲁侯，白顓蕞毕老父伐曆（歷），易圭瓚、彝一肆，鬯尊以毕备，易小子彝一家，白（伯）曰引以友五十夫。伐拜稽首，敢对扬朕公子鲁侯不显休，用乍吕姜□宝尊簋，其用夙夜享于宗室，用祈屯鲁，世子子孙永宝用。

伐簋铭文所记历日为“唯王七年正月初吉甲申”。从器形看，其年代可安排在懿王至幽王期内。

宣王元年为前827年，是固定的，其七年即为前821年，是年正月丙戌朔，前二日甲申，与伐簋历日不甚相合。

〔1〕 此器器形与铭文亦见《铭图》05321号“我簋”（“伐”，吴镇烽先生在此书中读“我”）。

〔2〕 本铭中“老父”之称，亦为前所未见。器主人伐，受王命遗鲁侯，则本人当是王朝卿士。故“老”在此也许当释作《诗经·小雅·采芣》“方叔元老”毛传“五官之长出于诸侯，曰天子之老”中的“老”。鲁侯称伐为“父”，应是由于伐为此鲁侯之父辈，下边铭文中伐称时任鲁侯为“朕公子鲁侯”，应当理解是为“朕公”之子鲁侯，是上一任鲁侯为伐之兄长，故现任鲁侯为其兄之子。鲁侯赐给伐的器物，除圭、瓚等玉器外，尚有彝一肆，即铜礼器一列，“鬯”或当读作“隸”，即指一肆彝器中包括有下列“尊”与“备”，尊，当是指青铜酒器，“备”或即《周礼·小宗伯》“告备于王”郑玄注备“谓饌具”，在此即青铜食器。



幽王元年前781年，这亦是个定数，其七年前775年，是年正月戊午朔，甲申为二十七日，显然亦不合于伐簋历日。

在根据上文所讨论之结果，延长共、懿王在位年数后，懿王元年已暂设在前907年，其七年即为前901年，是年正月如以庚午为朔日，甲申为十五日，则与伐簋历日不合。孝王在位年，在本文所拟金文年历表中只有三年（按：孝王是共王弟，共王执政如达三十余年，其子懿王又有二十年，则至孝王及位时，其年岁必已高，在位年数短应是有可能的），故伐簋不会属孝王。夷王七年设为前878年，其正月丁巳朔，甲申为二十八日，亦肯定不在“初吉”范围内。这即是说按本文所拟新的金文历日方案，伐簋亦不能进入懿王、孝王、夷王三个王年组。

最后看一下厉王历日。在断代工程历谱中，厉王元年为前877年，七年前871年，此年正月丁未朔，九日甲申，按现在通常采用的，初吉范围可在初一至初十范围内，则厉王七年历日与伐簋历日相合。这样看来，伐簋的历日可容在厉王器组中，故伐簋历日并不能牵动断代工程历谱中王年的调整。

根据《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湏立。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可知伐簋铭文中所见“鲁侯”应是鲁献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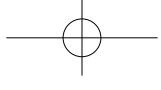
七 西周中期金文历谱的调整

根据上文论述，本文将西周中期金文历谱作了初步调整[附表一]。像每次根据新历日资料对金文历谱作调整一样，现在提出的方案仍然只是一种力图容纳新的历日资料的尝试，因此自然就不可避免地使个别的以往曾纳入历谱的器物未能留在其中，如宰獸簋^{〔1〕}。此外，此表所列铜器历日中，“初吉”之日期设置与“既生霸”范围实有部分重合，这是个老问题，对此如何才能作更合理的解释，依然是今后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将这个表与断代工程历谱相比，不仅是懿王元年已不固守在前899年，懿王、共王、孝王的年数也扩充了，从而使穆王元年由断代工程金文历谱所设定的前976年，上升至前996年。此种扩充，不仅使近年来发现的西周中期的铜器历日得以容纳，而更重要的是，穆王元年的上升势必影响到西周早期诸王年数的设置与武王克商年数的变动。如上文已提到的，其实在虢公簋发现后，西周早期王年体系即已经要作调整了，这是大家都已知道的。

近年来，新发现的西周金文历日资料，不断提出新问题，亦就促使研究者不断修订所排金文年历表，但这个调整的过程，也是使我们的认识愈益接近西周金文历日的实际，从而不断深化对西周王年认识的过程。当然，西周金文年历的研究，应该只是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个层面，西周王年的研究应当依靠更多的学科及所具有的不同手段综合进行。

〔1〕 宰獸簋历日为“六年二月初吉甲戌”，在本文[附表一]中懿王六年(前902)二月丙子朔，前二日甲戌，如将宰獸簋历日纳入此年，则其“二月初吉甲戌”是先天二日，仍不妥当。



〔附表一〕西周金文年历表（西周中期,附夷王年历）

穆王元年	前996				
二十四年	前973	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	夔簋	廿年又四年在八月既望丁巳	本月庚戌望
三十四年	前963	五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	鲜簋	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	
五十五年	前942				
共王元年	前941				
二年	前940	二月丙戌朔二日丁亥	吴方彝盖	二祀二月初吉丁亥	
		三月乙卯朔	趯觶	二祀三月初吉乙卯	
五年	前937	正月己亥朔十二日庚戌	五祀卫鼎	五祀正月初吉庚戌	
八年	前934	十二月丁丑朔十一日丁亥	齐生鲁方彝盖	八年十二月初吉丁亥	后天一日
十五年	前927	五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	十五年趯曹鼎	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二十二年	前920	四月庚寅朔二十日己酉	庚嬴鼎	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二十四年	前918	九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	觶簋	二十四年九月既望庚寅	
二十七年	前915	三月庚寅朔九日戊戌	二十七年卫簋	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	
二十八年	前914	正月丙辰朔十二日丁卯	斲簋	廿又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	
三十年	前912	四月癸酉朔二日甲戌	虎簋盖	三十年四月初吉甲戌	
		四月癸酉朔十日壬午	吴盃	三十年四月既生霸壬午	
三十五年	前908				
懿王元年	前907	九月辛未朔十七日丁亥	师潁簋	元年九月既望丁亥	
三年	前905	三月壬辰朔十一日壬寅	卫盃	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	
四年	前904	九月癸未朔五日丁亥	师酉鼎	四祀九月初吉丁亥	
九年	前899	正月戊午朔二十三日庚辰	九年卫鼎	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	
十年	前898	正月癸丑朔二日甲寅	吮簋	十年正月初吉甲寅	
十二年	前896	三月庚午朔二十一日庚寅	走簋	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	
十三年	前895	六月甲午朔五日戊戌	望簋	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	
十六年	前892	九月甲戌朔十一日甲申	士山盘	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	
二十年	前888	正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	休盘	二十年正月既望甲戌	
孝王元年	前887	四月丁未朔八日甲寅	元年师旋簋	元年四月既生霸甲寅	
三年	前885	五月乙未朔八日壬寅	逵盥盖	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	
夷王元年	前884	六月己未朔十六日甲戌	师虎簋	元年六月既望甲戌	
		六月己未朔十七日乙亥	召鼎	元年六月既望乙亥	
二年	前883	三月乙酉朔六日庚寅	王臣簋	三年三月初吉庚寅	
三年	前882	四月戊申朔十四日辛酉	师遽簋盖	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	本月癸亥望
七年	前878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 露）